

日本米泽藩旧藏宋版三史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

陈捷

在古代传入日本的众多中国古籍中,现在保存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宋版三史”(南宋黄善夫刊《史记》、《汉书》、《后汉书》)是中日古代文献研究者所周知的重要典籍。这三部宋版何时传入日本已不可考,但从书上有日本室町时代后期僧侣留下的批注可知,在此以前已经在日本流传。十六世纪末,此书转归米泽藩的武将直江兼续,以后收藏于米泽藩藩主上杉家及藩校兴让馆,明治维新以后直到近年被日本政府文化厅收购之前,一直收藏于旧藩主上杉氏家,所以在日本一般被称为米泽藩旧藏黄善夫本三史。黄善夫本三史不仅是校读这三种正史的重要版本,而且也是南宋中期建安刊本的典型,是研究三史以及宋代建安刊本的宝贵文献。其中《史记》一百三十卷是《史记》的《集解》、《索隐》、《正义》三注合刻本中最早的刻本,也是现在存世的黄善夫本《史记》中唯一完整的本子^①。同时,由于原书中有日本僧人释幻云(月舟寿桂,1460-1533)等人校读时加上的大量记号和批注,又是研究《史记正义》等古代典籍的佚文以及日本对汉籍的接受史、日本古代训诂的重要资料。日本政府1965年5月将这三部书指定为重要文化财,第二年又进一步指定为国宝。关于这三部宋版书的价值及其在日本的传承情况,日本学者尾崎康等先生已经有比较细致深入的考察研究^②,本文拟从近代中日学术交流的角度,对中日

①黄善夫本《史记》此外尚有国家图书馆藏残本共69卷、上海图书馆藏残本一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残本2卷。国家图书馆藏69卷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2卷均是江户时代学者狩谷棹斋求古楼本旧藏72卷残本中的一部分。国图本69卷1911年由田吴照在日本购得带回中国,不久就出现在旧书店中。其中66卷由张元济在北京正文斋购得,归涵芬楼收藏,2卷(《平准书》和《刺客列传》)由袁克文购得,后归南海潘宗周宝礼堂。袁克文于同年又得到另1卷(《河渠书》),后归傅增湘。回到中国后又遭离散命运的这69卷现在都藏于国家图书馆。

②具体研究可参看尾崎康《正史宋元版的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尾崎康著、陈捷译《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又这三部书在日本均已经影印出版,关于各书版本特徵的详细说明,可参看影印本所附解题:《汉书》(朋友书店,1977年),《史记》(古典研究会丛书,尾崎康、小泽贤二解题,汲古书院,1998年),《后汉书》(古典研究会丛书,尾崎康解题,汲古书院,2000年)。

两国学者围绕黄善夫本三史进行的学术交往加以考察。

近代以来,不少中国学者都知道黄善夫本《史记》、《汉书》、《后汉书》在古代传入日本并且保存至今。这一信息的最重要的来源应当说是来自近代中国出版史上最重要的出版机关之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本《史记》,因为该书影印了米泽藩旧藏黄善夫本《史记》的一部分。不过,中国人最早见到的米泽藩旧藏宋版三史并不是百衲本的影印本,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黎庶昌、杨守敬等人在驻日公使馆工作的时候,就曾经在东京旧米泽藩藩主上杉氏的宅邸中见到过这三部宋版正史,并把这一消息传达给国内的友人,以后也陆续有中国学者通过同一渠道到上杉家看书。笔者近年在考察清朝驻日公使馆的文化活动时,在当时的笔谈记录和书信中找到了一些有关的原始资料。本文拟根据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对当时的情况进行考察。此外,在研究张元济访查、影印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的情况时,又有幸找到了张元济为配补中国藏黄善夫本《史记》所阙部分托日本新闻记者德富苏峰介绍请人到上杉氏家摄影时的有关书信。近年国内外有多种关于张元济的资料集和研究专著问世,但似乎都未涉及他与德富苏峰的交往,也没有收入这些书信,故本文对这段史实和有关书信也加以介绍。

一、清朝驻日公使馆人员与日本米泽藩旧藏宋版三史

最早注意并有机会见到米泽藩旧藏黄善夫本三史的中国人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清朝驻日公使馆工作和几位与公使馆人员有密切交往的中国文人。1877年(明治十年)底,清政府在日本东京设置了驻日公使馆。首任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及其他公使馆工作人员在执行外交公务的同时,与日本各界人士广泛交往,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往来。当时有一位与公使馆来往极为密切的人物宫岛诚一郎,为公使馆人员观看旧米泽藩藩主收藏的宋版三史提供了机会。

宫岛诚一郎(1838-1911,天保九年—明治四十四年,号栗香,又称养浩堂主人,出身于米泽藩藩士家庭,少年时代在米泽藩的藩校兴让馆学习,还曾经担任兴让馆的助教。在明治初年的戊辰战争及官军战败之后新政府处置米泽藩的关键时刻,他作为旧米泽藩的藩士,曾经四处奔走,为保存米泽藩的地位而尽力,并在这一时期与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建者胜海舟、后来在明治新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大久保利通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明治维新以后,他移居东京,在新政府实施废藩置县之后,也仍旧与住在东京的旧藩主上杉茂宪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以何如璋为公使的清国公使团驻扎东京以后,宫岛诚一郎经常到公使馆访问,也常常在自己家中招待公使馆员。特别是公使馆从最初的增上寺月界院迁到麹町附近之后,与住在麹町平川町的宫岛家成为近邻,宫岛诚一郎与公使馆的往来更加频繁。在与公使馆员个人之间结下深厚友情的同时,他经常在公使馆与日本朝野人士的交往中牵线搭桥,在公使馆与日本政府之间也起

到了一种非正式渠道的消息传递人的作用。

根据现在见到的资料,最早关于中国人观看旧米泽藩藏宋版三史的记载是黎庶昌和杨守敬等人经宫岛诚一郎介绍到旧藩主上杉茂宪在东京的住宅看书的记录。据根据上杉氏家日志编辑的《上杉家御年谱》记载,经过宫岛诚一郎的联系介绍,1882年(明治十五年)7月3日,清国公使黎庶昌和书记官杨守敬到上杉家宅邸“拜观宝藏宋版三史”。根据上杉家的记录,为了招待清国公使,除了书籍之外,还陈列了江户时代学者物茂卿书写的屏风、狩野元信和牧溪画的屏风和挂轴等收藏品:

此日午后一点稍过,公使一行乘马车来邸。到玄关迎接,先引到二之间(陈捷注:二之间乃房间名称)。礼毕、奉茶一巡之后,引至二层,出茶点。由此到六迭之间(陈捷注:六迭之间亦为房间名称)阅览陈列好的宋版三史。其间上香槟酒、蛋糕等。阅览毕,公使至二层拜观陈列的宝物,又应主人所请,到楼下二之间桌上挥毫。^①

这一天,黎庶昌除了为旧藩主上杉茂宪书写了“望岳楼”匾额之外,还即席赋诗一首云:“天禄琳琅宋槧传,庆元佳本在人间。千秋鸿宝称双绝,可使刊行逮后贤。”^②杨守敬也写了两张字,下午五时才离开。

除了上杉家对接待细节的详细记录之外,宫岛诚一郎的日记和他保存下来的他与清国公使馆人员的书信、笔谈资料中,也有一些可以窥见当时具体情况原始资料^③。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宫岛诚一郎文书》中,有宫岛诚一郎抄写的一封清国公使黎庶昌给他的信函:

启者 日前趋领大教,借邕鄙怀。浮生半日,得此两人促膝而谭,良非易事,何快如之!仆雅有嗜书之癖。闻旧藩侯米泽上杉氏藏有宋板《史记》、《汉书》、《后汉书》三种,为奇密之宝,世所罕见,前星使何公曾一往观。鄙意亦欲援例增此眼福,敢烦阁下便中代为介绍上杉氏。倘蒙许可,仆当偕使署杨君同往修谒。仅以□于左右,希鉴察焉。

黎庶昌再拜 五月十四日

宫岛诚一郎阁下

①《上杉家御年谱》20 茂宪公(2)《茂宪公御年谱》卷三三,第 649-652 页,米泽温故会,1988 年。原文为日文,笔者译。

②《观上杉敬高所藏宋槧三史赋赠》。

③宫岛诚一郎少年时代曾经学习汉文,能够用汉文与中国人笔谈。他和公使馆员们会面时有时通过翻译交谈,更多的时候往往通过笔谈的方式沟通。这些笔谈记录以及日常的书信、便条等资料有不少被宫岛诚一郎收藏起来,和宫岛家的其他文书一起保存至今,现在大部份收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及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特别资料室。关于这些文书的情况,可参看拙著《明治前期中日学术交流研究——清国公使馆的文化活动》(《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國公使館の文化活動》),汲古书院,2003 年。

从这封信中可以知道,刚刚到任不久的清朝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请求官岛诚一郎代为介绍旧米泽藩主,希望到其府上观看宋版三史。信中还援引前任公使何如璋的先例,由此可知何如璋也曾经前往上杉氏府中观书。

根据官岛诚一郎日记,他接到黎庶昌的来信后马上与上杉家取得了联系,安排了黎庶昌、公使馆随员杨守敬和黎庶昌的女婿、张裕钊之子张沆的访问。这天上午,官岛诚一郎提前来到上杉家准备,下午,杨守敬和张沆先到一步,不久,公使黎庶昌也随之赶到^①。官岛诚一郎保存的资料中还可以找到这一天他们在上杉家访问时留下的一些笔谈记录,通过这些记录,可以了解观书时的具体情形和交谈的部分内容^②。在他们的交谈中,与宋版三史直接有关的有以下内容。

黎:[三史首尾]完善,真为人间希有之本。贵藩侯何不集费刊行,衣被天下,为功不小。(C42/35)^③

黎:[现今有]西洋照相之法。此书若以照影刊行,于原书无损,而又丝毫不肖。盍试图之?(C42/36)

黎:昔河间献王好书,多得古册,后世美之。贵藩侯若将此书布扬于世,异日亦河间之比也。

官:今得此赏赞,他日誓欲无虚此事。(C42/38)

黎: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鄙意[如是]。(C42/41)

官:阁下言亦然。然而今日唯久宝藏之,不示之于人,故得全存。今经大邦诸贤鉴定,若付之梓,愿得公序。

黎:贵藩侯果有刊刻之盛举,仆虽不文,定当引序其端,不敢辞也。此书若刊成,敝国[销](消)行必众。(C42/37)

杨:黎公近日不惜多费摹刻逸书及古本之罕见者,凡二十余种。此二叶其式样也。贵侯《汉书》若得摹刻传世,尤为快绝。

杨:此二册借抄之,何如?

弟近作《东瀛访书志》,每书影摹其首一叶,为《留真谱》。此三史他日若为弟各摹一叶以为《留真》之冠,尤所不敢请也。若贵侯允许,则他日以所摹之式呈数叶。(C42/20)

在官岛诚一郎的陪同下,三人阅览了三史。谈话之间,黎庶昌多次向官岛诚一郎提出应当刊刻三史。他首先说如果上杉氏能够筹集资金刊刻

①《日志》:“晴 八十四度 十一时,前往上杉家,进行接待的准备。午后,杨守敬、张沆来,不久黎公使亦至。”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②原始资料见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藏《官岛诚一郎文书》。关于现存此日笔谈资料的详细内容,请参阅拙稿《杨守敬与官岛诚一郎的笔谈录》(《杨守敬と官島誠一郎との筆談録》),《中国哲学研究》第12辑,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1998年。

③()内的号码是收藏者的文书编号及为整理方便而加的号码。

三史,将是衣被天下的功绩,又介绍了用拍摄照片代替影摹的复制方法,向宫岛说明这种摄影的方法完全不会对原书造成损害^①。接着进一步引用汉代河间献王爱书的故事,以为如果上杉家能够刊行三史,一定会像河间献王那样留下美名。当宫岛诚一郎谈到如果能够付梓希望得到黎庶昌的序文时,黎庶昌马上允诺说,如果真能有此盛举,则自己一定代为作序,并且预测,此书在中国一定会有销路。与此同时,杨守敬也向宫岛诚一郎介绍了黎庶昌和他正在进行的《古逸丛书》刊刻工作,并提到他正在编辑《东瀛访书志》(即后来的《日本访书志》)和《留真谱》,希望宫岛能代他摹写三史书影,以便收入《留真谱》。在告别上杉家时,黎庶昌还再次对宫岛强调说:“三史总以刊刻传世为盼”,表达了他对影刻三史的期待。

从杨守敬对宫岛诚一郎的说明来看,此时黎庶昌和杨守敬二人影刻《古逸丛书》的计画已经开始进行。关于编辑刊刻《古逸丛书》的动机和意义,黎庶昌曾在《刻古逸丛书叙》中这样写道:

惟夫古籍之仅存,兵燹腐蠹之无常,其势不日趋散亡不止。学士大夫虽病之,而无术以免。惟好之而即求,求之而即传,差足救敝于后。余非苟为其难也。古书之流遗,何幸复见于异邦,而自余得之,且以付刊焉,余亦不自知所以。然庸詎知非天之有意斯文而启余赞其始也。余患不学久矣。今天假此使事岁月,俾得从事读书,不可谓非厚幸。(中略)古书之不亡,古人之精神自存寄之,岂余所能增重。而独至搜辑之责,似若默以畀余者,固不敢不勉也。

在黎庶昌看来,覆刻古籍的行为不单纯是出于文人学者个人的兴趣爱好,尽力保存在战争、虫害等各种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下不断散失消亡的古代典籍,是学者、士大夫的义务。再三向上杉茂宪及宫岛诚一郎提出刊刻三史的建议,如此热切地期待宋版三史的刊行,这正反映了黎庶昌“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珍贵的古代典籍应该成为天下人共同的宝物的信念。

这次到上杉家观书之后,杨守敬与宫岛诚一郎一直保持往来。从现存二人之间的笔谈记录看,杨守敬曾经将《留真谱》稿本拿给宫岛看,又几次向宫岛说明摹写书影的方法,一直试图通过宫岛诚一郎得到宋版三史的书影^②。但是,回国后出版的《留真谱》并未收录这三部宋版书的书影,可见出于某种原因,宫岛诚一郎没能满足杨守敬的要求。宫岛诚一郎1886年(明治十九年)曾经

①用拍摄照片代替摹写的方法覆刻古书,这是杨守敬在东京期间与日本摄影师和日本刻工一起研究出来的新技术,其原始资料亦见于《宫岛诚一郎文书》。其原文可参看拙稿《杨守敬与宫岛诚一郎的笔谈录》。又关于杨守敬与日本摄影师、雕版刻工一起研制利用摄影技术复制古籍方法的情形,可参考拙稿《关于杨守敬与日本刻工木村嘉平交往的考察》(《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详细情况请参看拙稿《杨守敬与宫岛诚一郎的笔谈录》。

将此日笔谈加以整理抄录,《宫岛诚一郎文书》中保存的誊写本有宫岛题识云:“明治十五年仲夏,偕清公使黎庶昌趋本乡旧藩主上杉邸观宋板三史。时谈数则,顷应藩主敬斋侯需,编纂成册云。”由此可见数年之后上杉氏对黎庶昌等人的来访一事还心存怀想。而黎庶昌反复建议的刊刻宋版三史却未能实现。

此外,《上杉家御年谱》还有三处有关前来观书的访客的记载,除了1886年(明治十九年)1月18日中村敬宇前来拜观宋版书的记载以外,其他两次都是经宫岛诚一郎介绍而来的中国客人。据此可知,1887年5月25日,清人王咏霓、清公使馆参赞管陈明远等数人到上杉家观书^①;1889年1月6日,清人萧穆^②、公使馆随员陈渠^③、函馆新泻领事馆副理事官刘庆汾、清公使馆顾若波^④及农商参事官寺田弘等人也曾至上杉家观书^⑤。王咏霓、陈明远等人的阅览书目除《史记》、两汉书外,还有《左传》和《千金方》等。王咏霓在观书之后抄录他的近作《送曾劼刚少司马还朝四首之一》送给上杉茂宪,并挥毫作大篆云:“清风明月不论价,近水远山皆有情。”陈明远亦为上杉茂宪写“嫫媿仙境”匾额。萧穆、陈渠都是对古籍研究颇有造诣的学者,两人都曾从日本带回一些汉籍,顾澐虽是画家,对收集古籍也很热心,现在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刊《钜宋广韵》就是他在日本以自己收藏的六朝铜佛交换带回国的。和他们一起前往的日本人寺田弘是一位极为热心的藏书家,杨守敬在日访书时也得到过他的帮助。《宫岛诚一郎文书》中有萧穆致宫岛诚一郎的信函云:

前承大君子雅意,俾得到上杉公家见宋槧《史记》、两《汉书》,实为东游第一快事。不知将来贵国有好古君子,能招股集费重刊否?鄙人拟重游贵国,亦携宋槧及墨宝数件,再请大君子会同上杉公,互相赏玩之,未知可否?便中晤上杉公,尚祈先容,并致鄙意,是所拜祷。^⑥

由此可知,他把在上杉家见到宋版三史视为此次日本旅行中最愉快的事,在感谢宫岛的介绍之劳的同时,和黎庶昌、杨守敬等人一样,他也期待着日本有人能够招股集资将其覆刻。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何如璋、黎庶昌、杨守敬、萧穆、陈渠等人都曾见到米泽藩旧藏的宋版三史,在对其价值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都期待著能够有人将其覆刻传布。可惜这一愿望在很长的

①《上杉家御年谱》21 茂宪公(3)《茂宪公御年谱》卷三十七,第127-128页。

②《上杉家御年谱》误作“兰穆”。

③《上杉家御年谱》误作“画工陈渠”。

④即画家顾澐,上杉家日志将他与陈渠身份弄混。

⑤《上杉家御年谱》21 茂宪公(3)《茂宪公御年谱》卷三十九,第189-190页。

⑥萧穆致宫岛诚一郎信函,署2月27日,当为萧穆回国后不久所作。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宫岛诚一郎文书》366/2。

时期中一直没有机会实现。

二、张元济为影印日本米泽藩旧藏黄善夫本《史记》与德富苏峰的交流

1926年,张元济从商务印书馆辞职,开始把精力集中于长期以来规划并已经起步的《四部丛刊》(《初编》于1920年开始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事业。1928年10月,他参加中华学艺社第5次学术视察团东渡日本,在访问长崎、广岛、京都、东京之后重新回到京都,于同年12月经长崎回国。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日本所藏的中国古籍,在出发之前,即利用日本公私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对有出版价值的古籍进行了选择。到达东京之后,他访问了当时的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等收藏机关以及个人收藏家,其调查成果在以后出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成果中得到了体现^①。在东京期间所作的诗作《戊辰暮秋至日本东京观静嘉堂藏书》中自注有“德富君出示古写本、刊本《论语》凡数十种”,可知他此时也见到了日本著名的新闻记者、藏书家德富苏峰并看到了他的藏书^②。

笔者曾经在坐落于日本静冈县的一个收藏有大量德富苏峰保存的私人信函的财团法人德富苏峰纪念盐崎财团查找到四封张元济给德富苏峰的信函,从这些信件中可以了解到张元济在回国之后与德富苏峰之间的交流。四封信函都通过当时在大阪每日新闻社上海分社工作的记者泽村幸夫^③转达,可知二人之间的联系得到泽村的帮助。

在这些信函中,民国十九年(1930)5月29日的信函中介绍近年访求刊印旧本正史的事业云:

曩者有搜印旧本正史之愿,访求积十馀年,先后得宋元佳槧甚多。今已校订蒐葺,付商务印书馆分期影印。仅呈见本一册,义例具详叙言,乞哂纳。

随信还附了《百衲本二十四史》样本一册。

紧接着,在同年10月3日的信函中,张元济告诉德富苏峰,他需要购买的宋版书《国朝诸臣奏议》已经托请北京的友人购得,随信还给德富苏峰寄去了

①关于张元济在日本的访书活动,和他一起访日的郑贞文所撰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见《(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②张人凤:《张菊生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75页。

③泽村幸夫是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总社记者,曾任该社支那课长、上海支局长。曾著有《支那农民的生活》(东亚经济研究会,1928年)、《支那漫谈》(东亚研究会,1929年)、《上海人物印象记》第1、2集(东亚研究会,1930年-1931年)、《支那现代妇人生活》(东亚研究会,1932年)、《江浙风物志》(东亚研究会,1939年)、《支那草木虫鱼记》(正一—5集)(东亚研究会,1934年-1941年)、《支那民间的诸神》(象山阁,1941年)、《年中行事篇》(文求堂,1941年)等著作,是日本当时著名一时的所谓“支那通”之一。

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的影印本《论语注疏》和《汉书》。在这封信的最后,张元济向德富苏峰提出,《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史记》一书拟用黄善夫本,但中国国内没有完本,希望他能代为了解米泽旧藩主上杉家所藏黄善夫本《史记》的情况,以便据以补足中国国内所缺的六十卷:

敝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所用《史记》,系用黄善夫本。但就国内搜求所及,尚缺六十卷之谱。闻贵国米泽旧藩主上杉侯爵府中存有黄刻完全宋本《史记》,谅曾阅及。拟乞代为询问其书是否尚存,可否通假,便中示之,渎神至感。

接到张元济赠送的影印书之后,德富苏峰马上在他主办的《国民日报》上介绍了张元济及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对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影印事业在古代典籍的保存和普及方面的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按照张元济的请求,他通过友人与上杉家协商,希望他们能够允许商务印书馆派人拍摄宋版《史记》的照片。撰于同年12月9日的张元济信函中有云:“前周获读贵报,蒙嘉许,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公谊私情,两深铭感。”正是对德富苏峰在《国民日报》上刊载的书评表示的感谢。信中还写道:

宋刻黄善夫本《史记》一书,承向上杉爵邸商借摄影,业蒙慨诺,至为欣幸。寄示写真三叶,虽加有句读附注,将来制版,尚可修正复原。敝处共缺六十餘卷,容即另开单,托长泽文学士邀同特约写真技师造谒,乞为转介上杉爵邸,以便摄影,并恳向爵前仅伸谢意。仰仗鼎力,俾宋刊腐史得成全璧,为《百衲本二十四史》生色不少。嘉惠同文,不特元济私人感戴已也。

据此可知,德富苏峰在得到上杉家的摄影许可之后,先寄了三张该书的照片给张元济。喜出望外的张元济立刻准备了需要摄影部份的目录,并请德富苏峰向上杉氏介绍,委托后来成为日本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的长泽规矩也带摄影师一起到上杉家拍摄。关于此事,张元济致傅增湘的书信中恰好有相关资料可以相互印证。在1931年1月15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信函中,张元济告诉傅增湘:

黄善夫《史记》衲史仅得六十九卷,余以震泽王本补配。近访得日本上杉侯爵藏有全部,已托友人借到,不日即可摄照。想兄闻之必为欣慰。^①

字里行间,透露出张元济在得知黄善夫《史记》的摄影已得到上杉家许可时的喜悦之情。

关于《史记》摄影的结果,在1931年6月10日张元济给德富苏峰的感谢信中是这样表述的:

前以求借上杉伯爵所藏南宋黄善夫《史记》,俾补完敝处残帙,影印行世。仰蒙先生转商黑井大将,代为请愿,得承慨允。此皆由鼎力在前,故

^①《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56页。

能得玉成于后。追维盛意，感戴莫名。今其书已摄影藏事，即可付印。以同文之秘笈，拜嘉惠而流通，亦敝国学界所欣幸不置也。

由此可知，从前一年10月开始，经过八个月的时间，在德富苏峰、长泽规矩也、摄影师以及上杉家的协助下，摄影的申请以及实际操作都进行得很顺利，此时已经摄影完毕，只待付印了。“以同文之秘笈，拜嘉惠而流通，亦敝国学界所欣幸不置也”一语，表达了张元济对德富苏峰的感激之情。

但是，不久以后，百衲本《史记》的出版工作却因为意外的原因遭受重大挫折。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军队攻击上海闸北，第二天，坐落于闸北的商务印书馆总厂遭到日军炮弹轰击起火。2月1日，拥有50万册藏书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及在同一建筑中的编译所遭日本大陆浪人放火归于灰烬。这一惨痛的事件使《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受到致命的打击，很多胶片和正在制版、印刷中的半成品被烧毁，有些用来做影印本底本的古籍也毁于一旦。关于《史记》的情况在闸北交通恢复后即赶往现场视察的张元济在给傅增湘的信中写道：

《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黄善夫《史记》底片据报均已事前携出，然弟尚未见。至初印样本则已均化劫灰矣。^①

同年9月24日张元济给商务印书馆丁英桂的信中又指示说：

（《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三期书拟加《史记》，日本照来底版尚在，公司自有半部及借潘、傅补照者，底版不知有否？就现在底版，先请打样。

由此可知，在日本拍摄的《史记》底片幸运地免于大火。从这封信也可以看出，即使在商务印书馆遭受重创、百废待兴的繁忙时刻，张元济也一直关心并直接指导黄善夫本《史记》的出版事务。

从最后的结果看，《史记》没赶上《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第三期，直到4年后的1936年才终于做为第6期配本之一问世。张元济《史记》所附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后序》中写道：

景印之始，海宇清宁。未及两年，战氛弥布。中更闸北之乱，抱书而走。乱定掇拾，昕夕无间，先后七载，卒底于成。世之读者，犹得于国学衰微之日，获见数百年久经沈霾之典籍，相与探本而寻源，不至为俗本所眩瞶，诎不幸欤？

短短的文字，传达出他在战乱中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实现了几代学者半个世纪以来的期待时的那种百感交集的心情。

以上，我们通过现存的笔谈记录和书信资料，对近代中日两国知识人围绕日本米泽藩旧藏宋黄善夫刊本三史的影印展开的交流进行了考察。古代典籍的背后往往有着各种人间的故事。跨越了中日两国广阔的空间与数百年的岁月而保存至今的日本米泽藩旧藏宋版三史重新介绍到中国的半个多世纪的过

^①1932年3月17日，《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283页。

程中,中日近代复杂的历史关系和两国学者间的交流、协作、隔绝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努力与复杂的感情纠结,都在其中留下了投影。今天,米泽藩旧藏宋版三史已经为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并且均有影印本刊行传世,供学者们利用。黎庶昌“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的理想终于开始为人们所理解。但是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距离这一理想的真正实现还相距甚远。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追寻和总结近代两国学人在保存和传布古代文献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与业绩,以便世人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他们在动荡的时代中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的重大意义。

附:张元济致德富苏峰书简

1. 1930年5月29日

苏峰先生大鉴:

前年东游贵国,归后曾于上年三月初肃寄寸函。岁月如流,又更裘葛,伏为道履清胜,定洽颂忱。弟杜门读书,愧无淑状。曩者有搜印旧本正史之愿,访求积十餘年,先后得宋元佳槧甚多。今已校订蕆事,付商务印书馆分期影印。仅呈见本一册,义例具详叙言,乞哂纳。均托由贵社驻沪记者泽村先生寄上,至祈察收为荷。德邻在望,时锡箴言,尤所感幸。专肃敬颂
著祺

弟张元济顿首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2. 1930年10月3日

敬恳转寄

德富苏峰先生

张元济拜干

苏峰先生大鉴:

五月二十九日泐奉寸函,并附呈影印宋本《论语注疏》,托贵社驻沪记者泽村氏代为寄上。续又呈奉新印宋景祐本《汉书》一部。又前承属代抄宋刊《国朝诸臣奏议》三卷,亦在北平友人处觅得刊本。泽村氏传谕,属为代购,并承发下书值华银百圆,如数收到。原书一册,亦托同氏邮呈。计均先后达览。敝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所用《史记》,系用黄善夫本。但就国内搜求所及,尚缺六十卷之谱。闻贵国米泽旧藩主上杉侯爵府中存有黄刻完全宋本《史记》,谅曾阅及。拟乞代为询问其书是否尚存,可否通假,便中示之,渎神至感。专此 敬颂

台祉

张元济顿首拜启

民国十九年十月三日

3. 1930年12月9日

敬烦转寄

德富苏峰先生 督收

张元济拜干

苏峰先生大鉴：

十月廿三日肃上芜函，谅尘记室。前周获读贵报，蒙嘉许，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公谊私情，两深铭感。宋刻黄善夫本《史记》一书，承向上杉爵邸商借摄影，业蒙慨诺，至为欣幸。寄示写真三叶，虽加有句读附注，将来制版，尚可修正复原。敝处共缺六十餘卷，容即另开单，托长泽文学士邀同特约写真技师造谒，乞为转介上杉爵邸，以便摄影，并恳向爵前仅伸谢意。仰仗鼎力，俾宋刊腐史得成全璧，为《百衲本二十四史》生色不少。嘉惠同文，不特元济私人感戴已也。元济自前月初偶沾微恙，近稍就痊，堪以告慰。朔风多厉，望为道珍重。专此 敬颂

台祺 诸希

亮鉴

郑君贞文附笔问候

张元济仅启

十九年十二月九日

4. 1931年6月10日

日本东京市外大森山王

德富苏峰台启

上海极司非而路四十号张絨

苏峰先生大鉴：

海天睽隔，音敬久疏，驰系之私，时萦梦轂。清和布令，伏审履候多绥，定符企颂。前以求借上杉伯爵所藏南宋黄善夫《史记》，俾补完敝处残帙，影印行世。仰蒙先生转商黑井大将，代为请愿，得承慨允。此皆由鼎力在前，故能得玉成于后。追维盛意，感戴莫名。今其书已摄影藏事，即可付印。以同文之秘笈，拜嘉惠而流通，亦敝国学界所欣幸不置也。专此陈谢。敬颂台祺，诸希

雅照

张元济顿首拜上

二十年六月十日

作者工作单位：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文学资源研究系